

大学教材

古代汉语

G U D A I H A N Y U

主 编 ◎ 王亚男 副主编 ◎ 李晓箴 董庆华 杨 辉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大学教材

古代汉语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主 编 ◎ 王亚男 副主编 ◎ 李晓箬 董庆华 杨 辉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汉语 / 王亚男主编.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222 - 10478 - 5

I. ①古… II. ①王… III. ①古汉语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①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1544 号

责任编辑: 赵丁丁
封面设计: 魔弹文化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名	古代汉语
作者	王亚男 主编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 ynpsh. com. cn
E - 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2
字数	563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北京全海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 - 7 - 222 - 10478 - 5
定价	35.00 元

前 言

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和历史专业的基础课，其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同时也为有志於将来研究语言的学生打好一定的基础。语言始终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学习古代汉语就是要掌握这些变化。就记录语言的文字而言，经历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文、隶书、楷书等形体的变化，楷书又有简体繁体之别；就书体而言，有手写印刷之分；不掌握字形的这些变化，我们就没法阅读相关的文献。

学习古代汉语对正确理解及使用现代汉语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现代汉语的很多词语是从古代汉语继承而来的，不明其确切含义，就会造成误解误用。如报刊上的一些文章在形容不施粉黛的女子时喜欢用“素面朝天”这一成语，但大多用得不是很恰当。这一典故来自杨贵妃的三姐虢国夫人。宋代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上记载说：“（唐玄宗）封大姨为韩国夫人，三姨为虢国夫人，八姨为秦国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给钱十万，为脂粉之资。然虢国不施妆粉，自衒美艳，常素面朝天。”意思是说虢国夫人自恃美丽，从不化妆，常常就以天然面目去见皇帝。“朝天”是朝见天子的意思，今天的素面女子不存在什么“朝天”的事，用“素面朝天”形容她们令人不知所云。又如媒体上有这样的报导：“开发商建材以次充好，第一批业主依法维权，诉讼拖了一年多，最后胜诉，第二批业主也群起效尤，提起诉讼。”依法维权是好事，怎么能说成是“效尤”呢？说明使用者没理解“效尤”（效法错误的行为）的确切含义。媒体上还常有“这位莘莘学子”的说法，也叫人莫名其妙。“莘莘”是众多的意思，一位学子怎么能叫“莘莘学子”呢？估计说这种话的人把“莘莘”理解成辛苦勤奋的意思了。可见古代汉语的知识对每一位现代汉语的使用者都是有用的。

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已经问世的不下二三十种，我们为什么还要新编一部《古代汉语》呢？我们编写这部《古代汉语》教材，是本着“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阅读使用各类古代文献的实际能力，使学生全面了解古代汉语的实际状况”的宗旨而编写，本书的主编为内蒙古党校的王亚男，副主编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的李晓箏，哈尔滨华德学院的董庆华，其中王亚男编写了第一至四章节，李晓箏编写了第五、六章节，董庆华编写了第七、八章节。

“古代汉语”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古代汉语指清代以前（包括清代）的汉语，包括文言（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及後代文人仿古作品中的语言）和古白话（汉魏以降，随不同时代实际语言发展而变化的较切近口语的语言）；而狭义的古汉语只是指文言。已有的古代汉语教材尽管版本众多，但基於“‘古白话’相对於‘文言文’较易读懂”的认识，大致限定在狭义的古汉语范围，

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传世文献中的文言文，编排上大都是“文选”、“通论”、“常用词”的三结合模式，而且文选材料大都经过了“现代化”的处理，文字并非是早期版本的原貌。事实上以口语为特色的古代文献并非不需要学习，在某些方面口语特色的文献甚至比正统的文言文还难理解。如《世说新语·自新》：“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一般教材解：“正：恰好。”大误，此为中古词语，正，从止声，音义同“止”，为“只、仅仅”义。字又作“政”《魏书·释老志》：“兴叹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又如《祖堂集·鼓山和尚》：“拟论佛与祖，特地隔天涯”，“特地”乃“反而”之意。即便是《金瓶梅》这样的“大白话”作品，其中的难解之处也比比皆是。我们认为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文史学习者，对古代汉语的了解仅限于文言文是不够的，难以适应文史学习及研究的需要，也不利于语言学人材的培养。为此，我们采用广义古代汉语的概念编写了这部《古代汉语》，目的是让学习者对古代汉语的面貌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本教材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时间跨度大。从最早的甲骨卜辞直到清末，上下三千年，各个时期的语料都有所涉猎。

(2) 文选类型多。古代汉语的文选部分，以往基本上选自传世文献。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我们在选材上除了大部仍选自传世文献外，还增加了各个不同时期出土文献的内容，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石刻简帛及敦煌写卷等。选择一些出土文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本教材不但有正统的文言文，也有口语色彩较浓的古文和古白话，古白话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了解一些古白话知识，对于全面了解古代汉语历史以及促进现代汉语的学习与规范也有着重要作用。为此，我们不仅选择一些古白话作品，而且在“通论”中也涉及了与古白话相关的辞汇、语法、语音以及文字知识。

(3) 贴近古代汉语原貌。今天的学习者熟悉的是铅字排版的书籍，真正的古籍可以说是没有太多的接触。为了让学习者了解古代汉语的真实面貌，培养学习者对古书的熟悉感和亲和力，打消他们对古籍的畏难心理，本教材不仅直接选用了各种出土文献的图版，而且对传世文献或者提供善本影印件，或者力求忠实地据善本转录。

当然，由于我们编写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原因，教材中不是之处还会存在。在此敬请各位专家、读者雅正。

编者

目 录

第一章 文字	(1)
第一节 汉字概说	(1)
第二节 汉字形体的演变	(7)
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	(13)
第四节 汉字的字际关系	(22)
第五节 汉字的正俗	(27)
第二章 词汇	(46)
第一节 词汇概说	(46)
第二节 古今词汇的继承与发展变化	(49)
第三节 古代汉语的多义词	(53)
第四节 同义词与反义词	(61)
第三章 音韵 (一) ——上古音知识及其运用	(71)
第一节 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	(71)
第二节 上古汉语的韵部系统	(83)
第三节 上古汉语的声调系统	(91)
第四节 近体诗的格律	(96)
第四章 语法	(110)
第一节 语法概说	(110)
第二节 词类活用	(112)
第三节 数词和量词	(127)
第四节 古代汉语的虚词	(133)
第五节 副 词	(145)
第六节 介 词	(155)
第七节 语气词与兼词	(159)
第八节 语 序	(166)
第九节 古代汉语的特殊句式	(170)
第十节 特殊语序	(174)
第十一节 文言文今译	(180)
第五章 音韵 (二) ——中古、近代音知识及其运用	(188)
第一节 《切韵》音系与诗律	(188)
第二节 《词林正韵》与词律	(202)
第三节 《中原音韵》与曲律	(208)

第六章 修辞	(216)
第一节 古代的修辞理论	(216)
第二节 修辞格	(231)
第七章 训诂	(245)
第一节 训诂和训诂学	(245)
第二节 文献注释	(246)
第三节 训诂专书	(255)
第四节 阅读古书的基本知识	(265)
第五节 古书注释的体式	(268)
第六节 古书注释的内容及古注的术语	(270)
第七节 工具书介绍	(286)
第八章 阅读文选	(299)
一 晋公子重耳之亡	(299)
二 离娄(上)	(303)
三 谷风(邶风)	(304)
四 氓(卫风)	(306)
五 七月(豳风)	(309)
六 谏逐客书	(312)
七 艺文志诸子略	(315)
八 报任少卿书	(320)
九 治 家	(328)
十 洛阳伽蓝记	(332)
十一 景 明 寺	(332)
十二 朱子语类	(335)
十三 秋浦歌十七首(选一)	(336)
十四 南阳送客	(336)
十五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336)
十六 宋词(十首)	(336)
十七 定风波	(337)
十八 菩萨蛮	(337)
十九 鹧鸪天	(338)
二十 醒世姻缘传	(338)
二十一 戏子恃权驱吏部	(338)
二十二 贾谊论	(342)
二十三 五代史伶官传序	(344)

第一章 文 字

第一節 漢字概說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我們使用的漢字，從甲骨文算起，已經有 3300 年的歷史了。甲骨文有 4500 個單字，已經能够完整地記錄當時的語言。在甲骨文中，雖然還有不少接近繪畫的象形字，但也有不少指事字、會意字和形聲字，還有大量的假借字。這表明甲骨文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了，所以，甲骨文不是漢字的源，而是漢字的流。那麼，漢字是怎樣起源的呢？歷史上對此曾經有過種種傳說，其中影響較大的主要有結繩說、八卦說和倉頡造字說。

一、漢字起源的傳說

（一）結繩說

據《周易·系辭下》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書契”即文字。可見在文字產生之前，“上古”經歷過“結繩而治”的時代。然而這“上古”究竟是指何時，《周易》沒有明言。又據《莊子·胠篋》記載：“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裡所提到的十二氏，估計他們是我國原始社會部落氏族的首領。據說，其中的伏犧氏教人結網捕魚，飼養牲畜，從事漁獵畜牧；神農氏制作耒、耜，教人耕作，他還遍嘗百草，終於辨別出各種植物的藥物作用，又找到了可以作糧食的五谷。伏犧氏和神農氏生活在距今約五六千年，這時我國氏族公社已達到繁榮時期，他們所生活的時代可以看作是《周易》中所說的“上古”時代。

所謂結繩，就是在繩上打結。那麼先民們是怎樣“結繩而用之”的呢？唐代孔穎達《周易正義》援引東漢鄭玄的注：“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援引《九家易》的注：“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過去在我國某些少數民族中也曾使用過這種“結繩而用之”的方法。例如：雲南的獨龍族人出門在外，就在繩子上打結來計算日子。每走一天，就打一個結。哈尼族老人用結繩的辦法來記載村寨里所發生的大小事情，哈尼族人還把結繩當做契約憑證，據說他們在買賣土地時，先準備好同樣長的兩根麻繩，田價多少就在麻繩上打多少結，然後雙方各執一根為憑證。廣

西的瑶族遇到雙方說理，則各用一根繩子，說出一個道理就打一個結，誰繩上的結多誰就取勝。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阿拉特人、墨西哥祖尼人都曾使用過“結繩而用之”的方法。

有人認為，漢字是從結繩即那些大大小小的繩結發展起來的。例如朱宗萊先生在《文字學·形義篇》中說：“文字之作，肇始結繩。”劉師培先生在《小學發微》中也認為：“三代之時，以結繩合體之字，用爲實詞；以結繩獨體之字，用爲虛詞。舉凡圈點橫直之形，皆結繩時代之獨體字也。”

其實，結繩只能用來幫助記憶，只能充當備忘的記號，它還不能用來直接記錄語言，所以結繩不是文字。漢字也不是從結繩發展而來的，這是因爲：第一，簡單而有限的大大小的繩結是無法產生數量衆多而形體各异的漢字的；第二，從“上古結繩而治”，到“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中間還存在着重要的過渡環節，即由契刻到記號再到指事文字，由圖畫到圖騰族徽再到象形文字。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既然先民們在創造漢字之前曾經長期使用結繩的方法來記事，那麼我們的祖先在後來造字時，不可能完全不借鑒結繩的方法。在甲骨文里，有如下一些符號：

丨(十)、U(廿)、𠂔(卅)

學者們認為這三個符號分別爲“丨（十）”、“廿”（二十）、“卅”（三十）。這三個符號，豎綫中間的圓點像繩結，所以，大多數學者認為是取象於上古的結繩。

（二）八卦說

八卦的卦形、卦名和所代表的基本物象分別是：

卦形：☰ ☷ ☳ ☵ ☶ ☴ ☱ ☲

卦名：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兌

物象：天 地 雷 風 水 火 山 澤

傳說八卦爲伏羲氏所作。按，犧或作羲，伏羲或作包犧、庖犧。例如《周易·系辭下》：“古者包犧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把八卦與漢字的起源聯系在一起，肇始於晉代。例如晉代潘岳《爲賈謐作贈陸機詩》：“結繩闡化，八象（即八卦）成文。”宋代則普遍把八卦與漢字的起源聯系在一起。例如鄭樵在《通志·六書略·論便從》中說：“文字便從不便衡，坎、離、坤，衡卦也，以之爲字則必從。故‘☵’必從而后成‘水’，‘☲’必從而后成‘火’，‘☷’必從而后成‘𡿨’。”這是把坎、離、坤三卦的卦形說成是水、火、𡿨三字的原型。後來有人把八卦的卦形分別說成是天、地、水、火、雷、山、風、澤等八個漢字的古文。清代段玉裁在注釋《說文解字·叙》時說：“庖犧作八卦，雖即文字之肇端，但八卦尚非文字也。”劉師培先生在《小學發微》中說：“大約《易經》六十四卦，爲文字之祖矣。”

其實，八卦是原始社會中從事占卜活動的巫根據算籌制作的一種代表卦爻的符號，

用來象征各種事物。無論是八卦還是六十四卦，卦爻符號是單純而有限的，它不可能演化出數量衆多而形體各异的漢字。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個別漢字來源於爻象的可能性。現在已經證實，甲骨文、金文中確實有這類八卦符號。

（三）倉頡造字說

倉頡或作蒼頡。在有關漢字起源的傳說中，倉頡造字說影響最大，古書中記載也特別多。例如《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韓非子·五蠹》：“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厶（私）’，背‘厶’謂之‘公’，公厶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李斯《倉頡篇》：“倉頡作書，以教后誨。”許慎《說文解字·叙》：“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遠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异也，初造書契，百工以義，萬品以察。”《淮南子·本經訓》：“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我們知道，漢字是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數量衆多，它不可能由一個人所創造。我們僅僅根據漢字中所存在着的大量異體字的現象，就完全可以說明漢字不是一時一地一人所創。它是先民們集體智慧的結晶。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展》中說：“文字是語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語言一樣，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它絕不是一人一時的產物，它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有着長遠的歷程。”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中也闡述了類似的看法：“在社會里，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採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

既然創造漢字的人很多，爲什麼其他人都默默無聞而只有倉頡獨享造字的美名呢？《荀子·解蔽》對此作了解釋：“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這就是說，創造漢字的人很多，只有倉頡留傳下來了，是因爲他專心致力於造字，其水平比衆多的“好書者”要高，所取得的成績更大。在古代傳說中，往往將某種發明歸功於一人。上文所引《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將作車歸於奚仲，將作書歸於蒼頡，將作稼歸於后稷，將作刑歸於皋陶，將作陶歸於昆吾，將作城歸於夏鯀，即是證明。

歷史上是否確有倉頡之人，倉頡是否爲黃帝時期的史官，這的確難以稽考，然而當漢字產生了一定數量和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完全需要由專門精通造字并且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來加以整理，這樣才能使漢字系統化。作爲史官而專心致力於“作書”的倉頡也許就是這樣一種人。

二、漢字產生的途徑

盡管結繩說、八卦說、倉頡造字說都和漢字起源有一定的關係，但它們都不是漢字

產生的主要途徑。從考古發現的原始漢字資料來看，漢字產生的途徑主要有兩個：圖畫和契刻。這正如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展》一文中所說：“中國文字的起源應當歸納為指事與象形兩個系統。”指事系統，又叫刻畫系統，契刻當是其主要淵源。

（一）漢字起源於圖畫

很早以前，古人就有了“書畫同源”的觀念。例如《說文》：“書，如也。”段玉裁注：“謂如其事物之狀也。”鄭樵《通志·六書略》說：“書與畫同出……六書也者皆象形之變也。”甲骨文、金文中的一些象形文字，書寫逼真，在形體上與圖畫幾乎沒有多大差別。這顯然是在圖畫的基礎上簡化而成的，這也是漢字起源於圖畫的有力證據。然而圖畫畢竟不是漢字，圖畫與漢字有着本質的區別。第一，圖畫屬於藝術形象，先民們描繪圖畫，是爲了表現美、裝飾美觀，或者是爲了表達某種宗教觀念等目的；而文字屬於書寫符號，是爲了記錄語言。第二，某些圖畫雖然也能够表示意義，然而其意義並不固定，並且沒有讀音。這種圖畫充其量只能叫做“文字畫”；而作爲文字，它必須與語言中的詞結合，而詞是聲音和意義的結合體，因此必須具有固定的聲音和意義的符號才能成爲文字。由此可見，由圖畫到漢字，有一個質變的過程。第三，隨着文字的發展和日益成熟，象形字與圖畫的區別越來越明顯：象形字主要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或大體輪廓來“據義繪形”，而不是像圖畫那樣具體地描繪事物形象。

那麼圖畫是怎樣演變成漢字的呢？裘錫圭先生在《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中說：“用象形符號表示族名，很可能是原始表意文字產生的一個重要途徑。在商代文字里寫法特別古老的族名金文大量存在的事實，對我們的這個推測是有力的支持。”我們知道，原始社會中有一種“圖騰崇拜”的習俗，即把某種動物、植物或非生物如武器、工具、自然現象等當做是自己氏族的祖先，於是把它們當做本氏族的象征和保護神來崇拜。他們把這種圖騰當做本氏族的名稱和徽號，用來維護本氏族的團結，并借此與其他氏族區別開來。例如：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上，有“鳥”、“羊”、“魚”、“𪚩”等族徽標志；山東莒縣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有“旦”“戈”、“斤”等族徽文字；在甲骨文、金文中，這類族徽文字是相當多的。如果畫一個動物的圖形，譬如“虎”的圖形，一般說來它就只能是一幅圖畫；如果一個以“虎”爲名號的氏族，用一只虎的圖形來作爲本氏族的族徽標志，那麼屬於這個虎氏族的人和熟悉虎氏族的人，就會常常指圖呼名。這樣，“虎”這幅圖畫就通過氏族名這個環節與語言中“虎”這個詞固定地聯系到一起了，於是圖畫虎就約定俗成地變成了文字。在原始社會，氏族林立，這樣就可以有幾百個不同的族名族徽標志轉化爲文字。這是文字的自發產生階段。然後，先民們總結運用族名族徽標志轉化爲文字的經驗，就可以使更多的非族名族徽標志圖形轉化爲文字，從而進入文字的自覺創造階段。

（二）漢字起源於契刻

《釋名·釋書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契刻就是在竹木等物體上刻畫記號。其作用主要是用來記數，或用來提示事件。發展到後來，契刻之物還可以作爲人們經濟生活中的憑證。例如《老子》說：“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據《列子·說符》記

載：“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遍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漢字起源於契刻，這並不是說契刻就是漢字。同圖畫與漢字一樣，契刻與漢字也有着本質的區別：契刻雖然也能够表示意義，例如“契”上所刻的“齒”就是代表錢財的數目，然而契刻所表示的意義一般只有契約的雙方才明白；契刻沒有讀音。而作為文字，它必須與語言中的詞結合，而詞是聲音和意義的結合體，因此必須具有固定的聲音和意義的符號才能成為文字。由此可見，由契刻到漢字，也有一個質變的過程。

那麼契刻是怎樣演變成漢字的呢？於省吾先生在《商周金文錄·序言》中說：“原始社會勞動人民的創造文字，極質樸，極簡單，也是極符合於客觀事物的真象，所以，一二三三 都是積畫，以口為方，以○為圓，都是最原始的文字，還要早於其他象形文字，這對於考證文字發生的萌芽狀態是具有重要關係的。”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要》中指出：“已發現的半坡類型符號，絕大部份都刻在同一種陶器的同一個部位上，規律性很強。有的符號不但重複出現在很多器物上，而且還出現在不同的遺址里。看來，這種符號，至少是其中的一部份，很可能已經比較固定地用來表示某些意義了。除了用作個人或集體的標記之外，這種符號也可能用來表示其他意義。沒有文字的民族往往已經知道用符號記數。我國原始社會使用的幾何形符號，估計也會有這種用途。古漢字除了使用象具體事物之形的符號之外，也使用少量幾何形符號，一二三三（四）×（五）∧（六）十（七）八（八）丨（十）等數字，是最明顯的例子。跟這些數字同形或形近的符號，在我國原始社會使用的幾何形符號里是常見的。很多人認為這類符號就是這些數字的前身，這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一部分契刻符號經過改造整理而成為了漢字，一部分契刻符號直接被吸收到漢字中來。

三、漢字產生的時代和漢字體系的形成

漢字產生在什麼時代？一般認為，漢字起源於原始社會晚期的新石器時代。原始社會晚期形成了部落聯盟。部落聯盟對內需要加強管理，對外需要交際聯絡，單用有聲語言已經不能滿足需要，於是就萌發了書面語言文字。我國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遺址中，普遍發現了陶器刻畫符號。例如在西安半坡村和臨潼姜寨等地出土的陶器上發現了許多刻畫符號。如：

丨 || × + 1 丁 ↑ ↓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𠂌 𠂍 𠂎 𠂏 𠂐 𠂑 𠂒

這些符號屬於仰韶文化，距今已經有六千年歷史。它們絕大多數刻在陶鉢外口沿的黑色寬帶紋上，只要極少數刻在陶盆外壁，多數是燒后刻上去的。可知不是隨意的刻畫。估計這類符號是器物所有者或制造者的記號。對於這些刻畫符號，有些學者認為是我國較早的原始漢字，例如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展》中認為：“半坡遺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認為，這也就是漢字發展的歷史。”“在我看來，彩陶和黑陶

上的刻畫應該就是漢字的原始階段。”有些學者不贊同這種觀點。因為這類符號只是在半坡文化中被廣泛發現，而自此之后至甲骨文之前，約 3500 年被中斷使用，因此很難將它們推斷為文字，或者是甲骨文的前身。這類符號的含義還有待研究。

1974 年在山東莒縣陵陽河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發現了四個象形符號：



這些符號屬於大漢口文化，距今約有 4500 年至 5000 年歷史。它們一般刻在陶尊上腹部近口處，個別刻在近底部。大多數是一器一字，個別刻有兩個字。對於這些刻畫符號，有些學者認為已是文字，例如上面的四個符號第一個是“戊”，或釋為“鉞”；第二個是“斤”；第三個是“旦”，或釋為“旦”；第四個或認為是“山”的繁體，或認為是“山”的繁體，或釋為合體字“山山”等，並且它們的形狀和造字方法與甲骨文、金文都很相近。有些學者認為還不是文字，或認為只是原始記事範疇的符號或圖形體系，或認為與後來漢字形成有很大關係，是一種原始文字，原始的象形文字、圖畫文字或象形符號。

據 1986 年 5 月 1 日《光明日報》載：在陝西西安西郊出土了一批甲骨文，“它的筆畫細若蚊足，剛勁有力，字形清晰，字體結構布局嚴謹，與殷代甲骨文字體接近……有關專家分析認為這裡出土的甲骨文比過去發現的認為最早的甲骨文——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時代要早一千二百年以上。”

又據 1987 年 12 月 17 日《光明日報》載：“在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遺址出土的甲骨所顯示的契刻符號，早於安陽殷墟的甲骨卜辭 4000 多年，領先於素稱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紙草文書……這批契刻符號的形成年代比近年來發現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畫符號和山東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早 2000 年；從部分契刻符號的形體來看，個別與安陽殷墟甲骨卜辭的字形近似。”

另據 1994 年 7 月 31 日《南方日報》載：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宜昌縣楊家灣遺址出土了大量器物。楊家灣遺址是長江三峽地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遺址面積近 5 萬平方米。根據對出土的器物進行分析，其時代距今 6000 年左右。考古人員從該遺址中發掘出大量石器、玉器，還發現 170 余種刻畫在陶器上的符號，有的像水波、閃電、太陽升起等自然景觀，有的像谷穗、垂葉、花瓣、大樹等植物，有的像長蛇、貝殼等動物，有的像魚鉤、魚網、弓箭、叉具等生產工具，還有的反映了房屋建築與人類勞動的場景。這些象形文字比較系統地記錄了當時人們生產、生活狀況。殷墟甲骨文中許多符號與之十分接近。有專家認為，這些符號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象形文字。如果此說成立，則將漢字的起源又推到 6000 年前。

我們知道，從漢字的產生到漢字成為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這期間需要經歷漫長的歷史過程。那麼，漢字體系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呢？有些學者認為，漢字體系形成於夏代。其理由如下：

夏王朝的建立，標志着我國正式進入階級社會。從理論上看，統治階級為了有效地進行統治，迫切要求文字能夠比較完整地記錄語言，因此，他們必然會下大力氣對原始

漢字進行整理，使之形成比較完善的文字體系。從事實上看，夏王朝的世系能够被完整地保留下來，應當是只有在文字十分完備之后才有可能。

《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可見孔於是接觸過夏代文獻的。夏代有文獻，說明文字體系已經形成。

《呂氏春秋·先識覽》：桀將亡，“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欲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守法之臣自歸於商。’”這是夏人已經有圖書檔案的明確記載。夏末，夏朝已經建有圖書檔案，說明至遲在夏朝中期或更早的時期，漢字體系就已經形成了。

綜上所述，漢字起源與原始記事方法有關，特別是圖畫和契刻。其時期，當為原始社會晚期。其證據為仰韶文化，特別是大漢口文化陶器上的刻畫符號，距今有五六千年歷史。漢字體系的形成，在夏初，至遲在夏代中期，距今已有四千年歷史。

第二節 漢字形體的演變

一、漢字字體的演變

我們現在能够看到的成體系的最古老的文字，是距今 3300 多年前的商代文字——甲骨文。另外，商代還有陶文，金文等，不過其數量遠不及甲骨文。從甲骨文到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楷書，漢字的字體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這種演變過程，與社會的發展、書寫材料和書寫工具的改良或替換密切相關。從總體來說，漢字字體的演變可以分為古文字和今文字兩個階段。古文字階段的代表字體是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戰國文字（包括六國古文和秦國的大篆）、秦代的小篆；今文字的代表字體是漢代的隸書、魏晉至今的楷書（包括行書與今草）。其中隸書又分為秦隸和漢隸，秦隸（又叫古隸）是古文字與今文字之間的過渡字體，或叫古今漢字的分水嶺。下面將各種字體列表如下：

古 文 字				隶书	楷书
族名金文	甲骨文	周代金文	小篆		
				馬	馬
				魚	魚

(一) 甲骨文

商代的文字資料，主要有陶文、玉石文、甲骨文和金文，而以甲骨文為最多，所以商代的文字以甲骨文為代表。

甲骨文是商代契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文字。這種龜甲和獸骨是在河南安陽縣西五里的小屯村出土的，而小屯村一帶原本是盤庚遷都后商朝國都“殷”的所在，所以甲骨文又叫“殷虛（墟）文字”。又因其是契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所以又叫“契文”，或稱“殷契”。由於甲骨上所刻的內容主要是殷商王朝統治者有關祭祀、征伐、王事、天時、年成、狩獵等方面的占卜記錄，所以又叫“貞卜文字”、“甲骨卜辭”、“殷墟卜辭”或“卜辭”。

隨着殷商王朝的滅亡，殷都逐漸荒蕪而終成廢墟，甲骨文也隨之而長期掩埋於地下。清末，河南安陽農民在田間地頭時常發現一些龜甲獸骨，他們視其為“龍骨”而作為藥材賣給藥鋪。直到 1899 年才被王懿榮辨認為殷商時代的甲骨文。到目前為止，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總共 15 萬片左右。甲骨文中共發現單字為 5000 左右，據孫海波《甲骨文編》（1965 年中華書局版）統計，共收 4672 字，其中已經識別并且能够厘定的 1723 字，無法辨識或未能考定的 2949 字，另外還有合文 371 字。

甲骨文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成體系的最古老的文字，它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 綫條纖細，筆勢大多方折，字形瘦長。這是由於它所使用的書寫材料和所使用的書寫工具造成的。

(2) 沿用圖畫的寫實手法，較多地保留了圖畫文字的特點。甲骨文中絕大多數是不帶表音成分的象形和象意字，并且不少字形象逼真。只有少量的形聲字。

(3) 字的結構還沒有完全定型化。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字的方向可以變換，可以正寫、反寫、倒寫、斜寫。如“人”字可寫作，也可寫作。第二，偏旁可有可無，如“啓”字可寫作，也可去掉偏旁口寫作。第三，偏旁部首的位置也可移易，如“牡”字的偏旁“土”可在左作。也可在右作。第四，意義相同或相通的形符可以變換，如“牡”字的形符可以是“牛”而寫作，也可以是“羊”而寫作。第五，字的筆畫可多可少，如“示”字可寫作，也可寫作。

(4) 有相當多的“合文”（即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合寫在一塊，形式像是一個字，實際讀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代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如是“大甲”的合文，是四祖丁的合文。

(5) 假借字的數量極多，也有一些同形字。如“又”本像手之形，假借為又、有、佑、侑。又如前期甲骨文中的“火”與“山”、“甲”與“七”、“月”與“夕”為同一字形。

(二) 金文

西周的文字資料，主要有陶文、甲骨文和金文，而以金文為最多，所以西周的文字

以金文爲代表。

金文是古代鑄（少數爲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鑄或刻在青銅器上的文辭稱爲銘文，文字叫做金文。所謂青銅器，是指紅銅與錫的合金，其優點在於：熔點低，硬度高，易於鑄造，并可根據不同要求而調劑不同的紅銅與錫的比例。又因爲古人以鐘鼎爲青銅器的代表（古代青銅器一般分爲樂器和禮器兩大類，樂器以鐘爲代表，禮器以鼎爲代表），所以金文又叫鐘鼎文、鐘鼎款識、彝器款識。又因爲古代以祭祀爲吉禮，所以稱青銅器爲吉金，同時稱青銅器上的文辭爲吉金文字。

金文始於商代，如商代著名的司母戊大鼎，而延續至秦漢，其鼎盛時期是在西周。商代的青銅器上所鑄銘文，從一二字到十幾字不等，多爲族徽或其他圖形文字，而西周的銘文多達數十字，甚至上百字或幾百字，如毛公鼎上有銘文 497 字，爲現存銘文最長的青銅器。金文的總字數與甲骨文差不多，已認識的字只有一兩千。

與甲骨文相比，金文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 (1) 筆畫比甲骨文粗壯，筆道用肥筆，屈曲圓轉。
- (2) 字體發生了顯著變化：象形和表意的意味減弱，而逐漸趨於符號化。只是有極少數字，尤其是表示族名族徽性質的字，依然保留着圖畫文字性質。
- (3) 形聲字大量增加。據統計，甲骨文中的形聲字占 20% 左右，而金文中的形聲字則達 50% 以上。

(4) 字的結構趨向定型化：一是字的方向很少變換，如“人”字只寫作亻；二是偏旁部首的位置比較固定，如甲骨文中的“彳”旁可左可右，而金文中則基本固定在左邊；三是意義相同或相通的形符一般不再混用，如甲骨文中的“牢”字的形符可以是“牛”，也可以是“羊”，而金文中只用“牛”做偏旁；四是同形字與合文現象大爲減少。

（三）戰國文字

自春秋以來，周室衰微，各國諸侯漸漸不再聽命於天子，并且諸侯各國之間不斷地進行兼并戰爭。春秋初期，諸侯國尚有 100 多個，到戰國初年，經過“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除了爲數不多的小諸侯國之外，形成了齊、楚、燕、韓、趙、魏、秦“戰國七雄”并立的局面。許慎《說文解字·叙》描述了這一時代文字的狀況：“其后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异形。”從總體上看，戰國時代的“文字异形”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六國文字，即六國古文；二類是秦國文字，即大篆。

其實，“六國古文”並不是像甲骨文和金文那樣一種固定的字體，這是因爲六國古文的文字資料種類較多，主要有簡帛文、金文、貨幣文、古璽文、陶文，以及《說文解字》和《三體石經》中的古文等，然而沒有一種字體可以作爲這一時期文字的代表；況且六國之間也同樣是“言語異聲，文字异形”。不過，如果綜合六國文字來看，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出它們之間所具有的共同特點，即異體繁多，簡體盛行。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一個字，不僅不同的諸侯國或不同的地區常常有不同的寫法，而且同一諸侯國或同一地區，甚至出於同一個人之手筆，也可能出現不同的寫法；另一方面在書寫漢字時表

現出極大的隨意性，使得漢字字體出現了大量的無規律可循的省變與訛變，從而破壞了漢字的規範性，

我們再來看秦國文字，即大篆。大篆的文字資料，主要有《史籀篇》和“石鼓文”，以及《說文解字》中所收的 223 個籀文。另外宋代發現的三種刻石《詛楚文》，也是屬於大篆一類的文字。

許慎《說文解字·叙》：“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宣王處西周晚期，相傳周宣王太史籀撰寫了《史籀篇》，為教學童之書，因此大篆又叫籀文。因此一般認為籀文是西周晚期的文字。春秋戰國之際，秦國處於宗周故地，其文字繼承了西周所使用的文字，後來在傳抄與使用過程中產生了一些訛誤，字體無疑也發生了變異，因此戰國時期的秦國大篆已與西周時期的大篆不盡相同，漢代人所見的《史籀篇》已非西周時期《史籀篇》之原貌，而是用戰國時秦系文字所寫的本子。

石鼓文是戰國初期秦國刻在十個鼓形石塊上的文字。10 個鼓形石塊上一共刻了 10 首歌頌田獵宮囿的四言詩，共 600 多字。兩千年以來，歷經搬遷與磨損，現僅存 300 多字。

大篆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 (1) 筆畫工整勻稱，文字大致左右均衡，字形豎長而略呈橢圓。
- (2) 字體更加趨向於線條化，並且線條長而圓轉。大篆基本上用圓筆，較少用方筆，線條一樣粗細。
- (3) 形體結構繁復。

(四) 小篆

小篆的文字資料主要保存在許慎《說文解字》里。《說文解字·叙》：“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裘錫圭先生在《古文字學概要》中指出：“《說文》收集了九千多個小篆，這是最豐富最有系統的一份秦系文字資料。但是《說文》成書於東漢中期，當時人所寫的小篆的字形，有些已有訛誤。此外，包括許慎在內的文字學者，對小篆的字形結構免不了有些錯誤的理解。這種錯誤理解有時也導致對篆形的篡改。《說文》成書後，屢經傳抄刊刻，書手、刻工以及不高明的校勘者，又造成了一些錯誤。因此，《說文》小篆的字形有一部分是靠不住的，需要用秦漢金石等實物資料上的小篆來加以校正。”

關於小篆產生的時代，許慎在《說文解字·叙》說：“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

對於許慎的這種說法，不少人表示懷疑。現在普遍認為小篆是由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文字逐漸演變而成的，而不是秦朝時對籀文“省改”而成。例如：王國維先生在《史籀篇疏證·序》中認為：“《史篇》文字……推其體勢，實上承石鼓文，下啓秦刻石，與篆文極近。考戰國時秦之文字，如傳世秦大良造鞅銅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詛楚文》摩本，文字亦多同篆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可見秦國文字至少到了商鞅執政的時代，已普遍通行小篆了，李斯他們只不過是在秦國原有小篆的基礎上，參考了大篆和古文，做了進一步的整理